

■ 声 音

报告文学如何选择题材、提升文学品质

□李燕燕

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和时代性决定了“主题创作”的重要性,但“重要”并不等于“单一”或“唯一”。除了“主题创作”,还有“民生百态”“社会万象”……报告文学不仅要聚焦重大工程、重大成就,也要勇于回应社会关切的具体议题,进而推动这个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

如何有效提高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是当下报告文学作家应该高度关注并身体力行解决的问题。要冲出这个“瓶颈”,就要勇于尝试变革,包括扩大题材范围,探索“呈现手段”,探究“非虚构”与“虚构”的尺度等



这些年,在文学圈里,“非虚构”这个词很火,与之相对应的是口述实录、田野调查等多种纪实形式。与此同时,报告文学在书写重大事件、典型人物等方面的作用,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对于“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的关系,有人将他们视为两种不同的文体,而且经常采取厚此薄彼的态度。事实上,“非虚构”的说法来源于国外,与“非虚构”相对的是“虚构”,也就是小说。可以这样理解,“非虚构”是一种以“真实”为原则的写作界限——不是体裁,只是写作界限。我认为,报告文学也是“非虚构”这种写作界限之下的文体样式。当然,“非虚构”包含的创作形式更加宽泛。所以,把“非虚构”与“报告文学”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这样的认知是不妥的。非虚构与报告文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说回到报告文学,这种新闻和文学结合的体裁,起源于欧洲,与近现代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在中国则被定名为20世纪30年代。近百年来,报告文学在中国文学体系里不断发展壮大,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现实作用,比如夏衍的《包身工》、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尤其是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被认为是新时期中国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报告文学作品。这篇作品发出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时代先声,在改革开放尚未正式启动之时,已深度地介入到时代重大主题的表达中。也正因如此,该作品一经《人民文学》刊发,便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读者争相阅读。自此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报告文学作家站在时代前沿,书写时代主题。中国报告文学中的“重大主题创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期。

当下,小说创作繁荣兴盛,不论是流派风格还是创作技法都种类繁多,更重要的是,当代小说理论研究也渐成一套完整体系。于是,人们普遍认为当下的叙事文体中,小说才是主流。与此相对应,报告文学由于呈现出过度“主题书写”且很多作品文学性不足,损害了这一文体应具有的表现、批评和引导功能。因此,无论在批评家还是在普通读者那里,报告文学都遭遇了一些诟病和冷遇。甚至有人质疑:我们还需要报告文学吗?

回答是肯定的,我们非常需要报告文学。我的认知是,中国故事独特瑰丽,其精彩程度远超一切想象,这就是非虚构写作的厚实土壤,也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底气所在。今天的时代,有着独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和情感,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去投入、去书写、去记录。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一定蕴含着来自生活的鲜活和复杂,带着时代特有的气味、声响、色彩和质感。报告文学也不例外。

我认为,今天报告文学遭遇的问题,主要来自两

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题材的选择;第二个方面来自写作本身。

先说第一个问题。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和时代性决定了“主题创作”的重要性,但“重要”并不等于“单一”或“唯一”。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需要展现和回答的东西太多了:“国之重器”需要展现在读者面前,辉煌成就需要书写;社会所关注的焦点热点也需要采访,并得出个性化的理解和呈现;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作家敏锐关注到的新事物新经验,也应当有所表达……新世纪以来,反映国家重大工程、重要成就的报告文学作品不胜枚举,也有很多作品直击社会关切的议题。例如,作家杨晓升的长篇报告文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聚焦独生子女问题。有媒体将杨晓升的这本小说称为“推动独生子女政策调整的功勋之书”。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讲述了上海女医生陈晓兰为揭露医疗领域触目惊心的医德沦丧和医疗腐败行为所作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牺牲。朱晓军通过该作品的书写,呼吁更多的人关心医疗领域,从而改变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有评论家指出,作家不能仅仅“站在道路一旁为驶过的车辆鼓掌”。我想说的是,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更应该主动去跟随、去助力、去提醒。所以,除了“主题创作”,还有“民生百态”“社会万象”……总之,报告文学不仅要聚焦重大工程、重大成就,也要勇于回应社会关切的具体议题,进而推动这个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

再说写作本身。很长时间以来,因为报告文学适于“宣传”的特点,很多人把报告文学与“通讯”甚至“软文”画上等号。报告文学作家因为利益关系,也愿意接受各种“命题作文”,导致这些年报告文学仅有“报告”而无“文学”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作品大量使用资料和数据,虽然说“单纯事实消息”和网络平台上的“公开资料”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这些东西大段大段甚至整页整页出现在一个报告文学作品里,会导致其文学性大打折扣,读者读之必定觉得索然无味。因此,有人甚至认为报告文学是“原创性最低的文学体裁”。还有的作品,直白地写事实,语言凝滞死板,无论结构还是叙事,都没有什么“讲究”。有人因此认为报告文学“写作门槛最低”。值得一提的是,在报告文学评论中,也少见对写作方法及技巧的评述,大部分仍停留在讨论题材本身的价值意义上。

如何有效提高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是当下报告文学作家应该高度关注并身体力行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要冲出这个“瓶颈”,就要勇于尝试变革,包括扩大题材范围,探索“呈现手段”,探究“非虚构”与“虚构”的尺度,等等。

就题材的选择而言,我认为,可“大”也可“小”。事实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小题材”。一叶可知

秋。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奋斗者,他们身上的故事,都必定带着时代的特有标记,他们都是精彩的中国故事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时代立传,为时代里奋斗着的普通人画像。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并不是手握“国字头”题材,就一定“胜券在握”;也并不意味着,身处基层,接触到的只有“小人物”“小事件”,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要知道,我们的写作,实际上与我们自身的经历和认知密切相关。我们看东西,有三种角度——仰视、俯视和平视。如果仅仅是仰视,我们可能只是看到观察对象的底部;如果仅仅是俯视,则可能只看到观察对象的顶部,而且只是流于表面的部分。因此,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真正深入进去,进行多角度的平视。在写作中,更是如此。之所以能够采取“平视”的视角,是因为,这是我们真正能够融入人的生活,我们在其中能够看到最多的面向,情感能投入得最多,“笔力”也能进入得最深。或许,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就是“好题材”。这样一来,也就使得报告文学的题材变得丰富多样,有“重大题材”,有“民生题材”,有“特殊题材”……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那么,我们看到了一个题材的多个面向,又该如何把它们呈现给读者?这就是呈现方式的问题。就像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作品,其采用的“口述史”写作方式,让千百种声音自己说话,相互支持,相互抵消。或许,这是对某些人群、某些经历、某些情感的最合适的呈现方式。好的报告文学,在“呈现”的过程中都极其注重细节,文字生动而极富张力。我个人比较爱读赵瑜和任林举老师的报告文学,他们的语言、叙事和结构都独树一帜。我认为,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叙事文体,“跨文体写作”是其重要特征。

对于报告文学来说,细节是关键。即使再善于表达的受访者,都只能依靠回忆讲出较“粗”的场景事件,具体到人物动作、心理和即时现场,必须依靠作家对生活的感悟、对受访者及事件的理解甚至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以精准贴切的语言一一展开,这也正是对真实的升华——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且敏感的话题,报告文学中的“非虚构”与“虚构”,或者说,报告文学能不能有“虚构”的存在?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报告文学必须真实,真实是这种纪实文体的生命。就像一棵大树,首先必须确保这棵树存在,且树干树枝都长在那里;接下来,枝头上的树叶,其具体形状、脉络以及色彩,就是允许“虚构”的部分。不要小看或者质疑这种细节上的“虚构”“加工”,这恰好是报告文学“文学性”的重要体现。或者这样理解,大树就是“报告”,其上添加的姿态各异的叶片,就是“文学”。

(作者系重庆报告文学作家)

■ 综 述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7月21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山东大学)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临沂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文艺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临沂市举行。临沂大学副校长张立富,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谭好哲,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山东大学)基地主任范玉刚,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中国文艺发展道路,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的。谭好哲认为,新中国75年来的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建设取得了不应忽视的历史成就。一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二是在文艺的本质与特征等核心性文艺问题上形成了“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文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艺是人类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三大主导性观念,并为具体的文艺创作和批评实践提供了理论资源。三是从理论和实践上确立起了指引文艺发展的人民方向,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美学。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丁国旗说,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根脉,切实加强中西文化文艺交流互鉴,牢牢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这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以守正创新的正气、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改革目标,这与我们进一步探索中国文艺发展道路、建构自主的文论话语体系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元浦谈到,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一方面积极传承发展古代文论话语,另一方面不断发展的今天,文艺面临着人工智能带来的诸多冲击。面对文艺发展现状的复杂性,我们要从文艺伦理的高度对技术进行监督和管理,让文艺能够借助技术实现良性发展。中国传媒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张晶将诗学中的“触物起情”与画论中的“天机自张”联系起来,认为两者都是传统感兴论的具体体现。“感兴”作为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其意义不限于创作发生的初始阶段,而是贯通于艺术创作的审美发生到艺术表现的基本路径。这些体现中华美学特色的重要审美范畴,对我们思考当下的文艺现象、文论议题依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廖尊尊认为,建构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这是我们进一步探究中国文艺发展道路的题中之义。要加强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体认,重塑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的根脉;要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的魂魄;要在立足社会实践、扎根文艺实践中,生发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

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属性。范玉刚认为,对“人民文艺”的命名和阐释,关联着我们对文艺本质的理解、对文艺审美特征的期待。强调文艺的人民性,旨在通过文艺提升人民精神境界、团结共同奋进的力量,自觉担当新时期的伟大使命。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德鸿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文艺“人民性”的变与不变,认为正是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国文艺发展史上才不断涌现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牛光夏结合近年来涌现的文艺佳作谈到,作家艺术家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获取切身体验和认识,把人民的生存境遇和真情实

中国文艺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探讨: 中国文艺的大道正在越走越宽

□本报记者 黄尚恩

感作为表现主体,写出激发人们情感共鸣的精品力作。

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我们探究中国文艺发展道路时必须思考的议题。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林雅华说,文化领导权的实现,不仅是通过文艺政策、历史经验、伦理道德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探索,为个人、民族、社会提供启迪或发展的前景,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强化党的文化领导权。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清认为,进入新时代,强化党的文化领导权,目的在于,为文艺的繁荣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引导作家艺术家创作出更多符合人民需要的文艺佳作。这需要我们深入探讨党的文化领导权与文艺原创力辩证协调的两强之策。激发文艺原创力,为大众提供优秀的文化食粮,提升全民族文化素质,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

中国文艺的发展,需要直面新的时代语境和传媒环境。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白浩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涉及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等问题。这需要一种从现代性焦虑走向以现代化灵魂的新时代文艺。时代之大变局、时代精神之号角,中国精神之魂正是新时代文艺评论所要聚焦的重要对象。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曹成竹表示,“讲好中国故事”既体现了文艺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又表征着新的时代语境下中国国家形象的“民族寓言”。从理论立场和文化导向方面影响了中国故事作为一种“感觉结构”的明晰和再度创造。山东大学教授凌晨光、山东省艺术研究院院长林凡军、山东艺术学院教授李磊、聊城大学副教授王传领分别聚焦了“人工智能写作中的时间逻辑”“人工智能与舞台艺术评论”“人工智能时代的现实主义创作”“人机互鉴语境中的新媒介文艺研究”等话题,认为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要彰显鲜活的生命力,保持其独特价值。

“中国(日照)散文季”等活动打通了日照文学的广阔通道。中国(日照)散文季对作家创作者的作品择优出版,在极大鼓舞了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的同时,带动了地方文学能力的整体提升;以出版的方式记录了当代日照故事,为当代散文的地方性发展提供了文化实践样本,积极推进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文化振兴。(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 关 注

当代文学“地方化”发展的“日照路径”探析

□张丽军

新时代中国文化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传承文化根脉,助力乡村振兴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中国文化依然存在发展不均衡、文化资源较为集中于大城市的发展瓶颈、困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地市级城市如何获得更多文艺创作资源,如何以文艺方式助推乡村振兴和传承地方文脉,就成为新时代中国地方文化与文学发展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一地方性文化发展困境,作为地级市的日照,通过“中国(日照)散文季”的举办,激活了有关日照文学的创作活力,提升了日照作家群体的创作能力,出现了一批优秀文学作品,构成了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的“日照散文现象”,从而为当代中国文学“地方化”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日照路径”。

从2019年起,山东日照市面向全国邀请各地知名作家到日照采风,了解日照历史、感受日照现实发展、畅想日照美好未来,打造了地标化

散文盛会——“中国(日照)散文季”,以此来展示“阳光海岸·活力日照”的新形象。6年来,120多位作家先后走进日照。众多散文名家参与了“中国(日照)散文季”活动,在了解日照、体验日照和思考日照之后,写下了关于日照历史与现实的文学作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刊发。

在众多散文名家的引领性写作中,“中国(日照)散文季”已经创作出了一批具有某种经典品质、地方文化特色的优秀日照文学作品。这些优秀文学作品,赋予“中国(日照)散文季”活动以灵魂、生命,并足以构成未来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浮来银杏外》《铺满玫瑰的乡路》《在日照经山历海》《茶园内外》《日照有个太阳节》等作品从不同视域,讲述了日照故事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家谱就是纸上的宗祠,一座道德的灵堂。杰人们出生于这个家族,又超越家族融入了民族,而民族又是无数家族的交集。为了他人,为了社稷,为

了朝廷国家甚至人类,奉献出自己的智慧甚至生命,虽然时过境迁,朝代演变,但是这些基于人性、人情的崇高精神,为社会构成了永恒的幕墙。”这是散文家丁建元从自己家族史出发,对中国家谱文化做出的深刻思考。“站在窗前,我像鱼一样,目力所及都是海……离海咫尺之隔,最近的浪涌,就在二十米开外。如此之近,又如此无边——凝望大海,我同时拥有了诗和远方。”不同于丁建元的历史沉思,当代散文家周晓枫的《海边的美术馆》向我们呈现基于海洋文化特色的“当代日照美学”。正如专家所说的,“正是有了作家们的生花妙笔,日照的发展脉搏和创造活力必将进一步激活,日照的历史与时代情感将进一步重塑。这些优美的文字和珍贵的情感,将成为日照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成为日照在岁月与时光中留下的永久光华”。

在国内文学名家引领和文学名作审美启示下,日照本土作家的文学创作焕发出了前所未

有的创作活力:地方文学创作队伍不断扩大,不仅创作数量、创作能力、审美水准有明显提升,而且创作了一批鲜活的、带有鲜明地方文化特征和独特个人生命体验的优秀文学作品。赵德发、夏立君、许家强、窦永堂、窦凤晓、王夫刚、李林芳、山东来、潘维建、李守忠等日照作家纷纷写出新的优秀作品,而且刘星元、葛小明等青年作家找到了新的发力点,获得了新成长。“他们伸出筋骨嶙峋的双手,做出抓篷握舵的动作,最老的船老大喊一声:‘吹来哟哟!’其他人接唱:‘哟来哟哟!’那种近乎假嗓的高亢声音,像电流一样突然将我击中,让我的半边脸酥酥的,心脏也震颤不已。我看见,船老大们一边唱,一边竭尽全力做着动作,全身的肌肉统统绷紧。我恍惚间看到,他们正踩在甲板上,通过一下下拉拽,让篷帆升起、张开,让船借助风力驶入大海……”赵德发的《船老大》呈现了昔日船老大的海上渔猎生活的生命光彩以及当代失落。“日

日照绿茶和日照黑陶,就这样在异乡不期而遇了。饮茶心需静,但茶本身要动起来,唯有于壶中日月里起舞人间的尤物,才能将自身的滋味搅动挥发出来。日照绿茶不独如此,因为对于这些绿叶的躯体里藏着光,而它们自己又将躯体藏身于历史藏身的黑陶之中。此刻,茶以翩跹之姿擦拭着陶,陶以承载之心呼应着茶。”青年散文家刘星元的《日照舞曲》把日照古老的黑陶文化与当代绿茶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一起,编导出了独特的“日照舞曲”。